

陳耀煌,《統合與分化: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1921-1949》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510頁。

李福鐘*

中國共產黨藉著「農村包圍城市」策略贏得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國共鬥爭，基本上已成為學術界對於這段歷史的普遍定論。然而共產黨究竟如何在農村基層建立穩固政權？尤其過程中一些技術面、方法面的細節問題，包括究竟如何對待農村中的既有傳統勢力？應該偏向聯合（統一戰線）還是鬥爭（階級鬥爭）？如果採取階級鬥爭策略，則勢必動員群眾，但是群眾如何動員？如何才能鼓動貧雇農團結一致，對抗擁有千百年統治傳統的地主、富農階級？動員農民涉及作為誘因的土地及租佃政策，究竟應該採取較激進的土地改革政策？抑或相對溫和的減租減息？區隔對待地主、富農等統治階級的政策標準如何拿捏？又如何因時、因地制宜？所有這些細膩的決策及操作，都涉及到中共是否能夠在不論國民政府或日本侵略者的優勢武裝統治下，順利建立農村根據地，並讓農民死心塌地而且毫無選擇地聽命於中共領導幹部的指揮號令。

陳耀煌這本2012年8月出版的專書《統合與分化: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1921-1949》，嘗試以河北一省的中共基層組織演變及發展歷史作為取樣，用以解開上述多項錯綜複雜、而且往往隱晦不明的歷史謎團。就這一點來說，本書就問題意識及關懷主旨而言，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過去半個世紀來在這個領域的先期研究，包括詹隼(Chalmers Johnson)、馬思樂(Maurice Meisner)、胡素珊(Suzanne Pepper)、裴宜理(Elizabeth Perry)、薛爾頓(Mark Selden)、戴瑞福

*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Ralph Thaxton)，以及陳永發等學者，對此曾展開繁複且針鋒相對的學術辯論。《統合與分化》一書，是這一系列漫長辯論在二十一世紀初的一場加時賽，是有關中國共產黨基層農村權力取得的另一個檢視樣本與詮釋可能。然而透過本書，核心問題最終水落石出了沒有？恐怕還言之過早。就如同人類歷史上其他的重大謎團與疑難雜症一樣，中國共產黨何以在中日戰爭期間(1937-1945)於華北地區建立強而穩固的農村政權，由於涉及幅員廣大且千頭萬緒的事件細節，以及不同的關心層面和觀察視角，我們自然難以像十八世紀法國百科全書派學者(Encyclopédistes)，或者是十九世紀末籌劃出版《劍橋現代史》(*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的總編輯 Lord Acton 一樣，斬釘截鐵認為只要當一切史料和證據都蒐集到手，一切疑問自可迎刃而解，真相大白。歷史謎團一如法曹斷案，某些邏輯上非黑即白的小範圍事件，答案「或許」真的只有一個，但並不表示所有「貌似或許」的真相加總起來，便能夠建構出唯一且顛撲不破的解釋。事實上，構成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s)之一磚一瓦的事件真相，是否均能夠一一斷定，已足以令歷史學家沉吟再三；更何況為數繁多的事件真相彼此間交錯穿插，而人類有限的智力與保存手段勢必不可能窮盡所有證據，歷史記錄的空白缺陷處，注定歷史學家只能在有限的文獻島嶼間尋蹤跳躍。這種歷史論述過程中所必須面對的知識窘境，早已是歷史學入門的 ABC。類似中共在 1930 至 1940 年代如何在中國農村建立武裝根據地這種問題，時間跨距超過二十年，空間又涵蓋舊江西蘇區到戰時華北及長江流域的林林總總經驗，中共中央與地方幹部之間更存在許多參差不齊的政策落差與因地制宜的變數，要釐清事實真相並找出具有普遍說服力的演化脈絡，確實並不容易。陳耀煌面對諸多學術前輩的研究成果，試圖透過中共官方歷史檔案的整理爬梳，尋找攻詰論辯的夾縫，確實難能可貴。這是評論本書之前，首先應當給予讚賞肯定之處。

關於此一議題之中共官方資料卷帙浩繁，即使本書所使用者，絕大部份均為當年中共地方幹部所書寫之工作報告。然而，斷爛朝報一般的瑣碎記載，以及可能有所循私掩蓋的片面證詞，真的能夠拼湊出七、八十年前河北農村中共

基層組織的活動實相嗎？更何況作者在剪貼這些報告證詞的過程中，始終關注在「由下而上的群眾動員」、「由上而下的黨國統治」、「被各式各樣人際網絡所撕裂的傳統社會」、「統一戰線與階級鬥爭的辯證統一」等若干既定論述框架中，這些命題基本上限縮了史料應用的可能性。再加上讀者在技術面上幾乎不可能再次檢證書中所徵引之大量繁瑣史料，以至於淹沒在浩如煙海的檔案證詞和格式化概念框架中的歷史真相，真正隨著本書的完成而水落石出了嗎？

我不禁想起 1941 年經典電影《大國民》(*Citizen Kane*)的結局，媒體記者 Thompson 追尋著關鍵字「玫瑰花苞」(Rosebud)來到主人翁 Charles Foster Kane 的大宅邸 Xanadu，在琳瑯滿目的口述訪談及遺物堆疊之間，Thompson 對同行的記者發出喟嘆：「我懷疑將所有東西擺放在一起，究竟能拼湊出什麼？查爾斯肯恩，還是玫瑰花苞？……總之，這解釋不了什麼」。(I wonder put all these stuff together, what would it spell? Charles Foster Kane, or Rosebud? ...Anyway, it wouldn't have explained anything.)

本書作者顯然相信一定數量的檔案拼貼，真的能夠還原歷史真相。然而非常零碎繁瑣的證詞紀錄，造成本書在閱讀過程中一個令人望而生畏的門檻，即除非對相關議題脈絡十分熟稔，因而能夠參透檔案文字背後所代表的知識意涵並忍受其催眠效力，否則對於其他領域的學術工作者來說，想閱畢高達五百頁的本書，仍然是一件高難度的工作，更遑論一般讀者群。然而，對於熟稔該領域的專家來說，作者編排及摘引史料的方式，卻又稍嫌武斷片面，致使相關主題的論證過程，不時出現削足適履的疑慮及歷史場景明顯窄化的危機。例如，由作者所設定貫穿全書的一組對照概念——「由上而下的黨國統治 vs. 由下而上的群眾動員」，從 1920 年代李大釗創建中共河北黨組織開始，到 1940 年代中共成功以華北農村武裝根據地抗擊日本占領軍及國民政府，全書將二十多年間中共官方檔案所見的報告史料裁剪進這樣的概念命題中，乍看之下似乎頭尾一致，整齊劃一，但是明顯掉進了歷史論述常見的後設圈套，也就是犯了後見之明的謬誤。1940 年代中共終於成功在動員底層農民的基礎上建立了華北武

裝根據地，在這一結果論的支撐下，「由下而上的群眾動員」與「由上而下的組織紀律」兩項原則似乎分別找到理論面與操作面的確切定位，成功達成辯證性的統一。作者未免因此見獵心喜，以至於拿相同標準來檢驗 1920 年代中共建黨初期以及 1930 年代國民政府剿共階段的河北組織發展史，因而得出結論：所有地方幹部所犯的錯誤都在於只曉得「聯絡上層」，卻無法「動員下層」。這種在單一角度檢視下所呈現出來的歷史圖象，加上對號入座的史料剪裁形態，造成本書論述及視角上的扁平呆板化，似乎 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中共在華北的發展失敗，問題都出在地方幹部不懂得或疏於「動員下層」，而只專注於「上層統戰」。至於 1940 年代以後中共在華北的成功，則是革除積弊，成功地動員了貧雇農。歷史寫作的敘述命題一旦簡化成爲這麼簡單的刻板公式，其實很難謂之成功，因爲直覺中理應錯綜複雜的歷史實相被單調化了，而閱讀時原本期待的趣味橫生，又被枯燥乏味的史料拼貼所破壞殆盡。

中國的共產革命並沒有教科書，蘇聯十月革命的經驗很快便證明無法在中國複製。也因此，1924 年國共合作之後中共的組織發展經驗，基本上是在一連串嘗試錯誤過程中的摸索學習。先入爲主地拿 1940 年代中日戰爭期間的成功經驗來檢討之前何以失敗的原因，邏輯上儘管可以言之成理，但歷史論述的多元性與趣味性則泰半喪失。以至於全書呈現的歷史脈絡，成爲單一的直線式發展，從 1920 年代建黨到 1949 年建國，革命不外乎一趟曲曲折折的長征之路，勝利的獨門配方就是「動員群眾」同時不忘「組織領導」，兩者完成辯證性之統一，而過程中其他一切的叢蔓枝節，作用只不過在於烘托締造革命成功之主旋律的正確性。依筆者淺見，這樣的主題形態，大可不必花費五百頁篇幅，連篇累牘地記錄二十餘年間每一歷史階段的大小事件人物。過於瑣碎且不加剪裁的史料拼貼，使得許多章節形同流水帳與沿革史。一本需要五百頁篇幅來加以承載的巨著，故事的曲折，情節的離奇，主題的層次，似乎都應該再稍加潤色一些。當然，對於年輕的學術工作者來說，這樣的境界層次，仍有待揣摩學習。

最後，筆者忍不住回想起 1979 年《史學評論》創刊號中，余英時教授所

寫的發刊辭。筆者初接觸該文時，仍是一名大學生，因此對余教授的一些觀點，畢生難忘。余教授提出歷史學界「史料學派」與「史觀學派」之間針鋒相對，各趨極端，以至於流弊互見。而過去三十年來台灣史學界在學術審核及史學教育的道路上，或許因為單方面強調知識的客觀性與可驗證性，因此基本上史料學派已儼然成為當今的學術正統，然而由此教育出來的年輕史學工作者，往往但知史料而無終極關懷。本書並不缺問題意識，這點上文已加以說明，只不過其堆砌史料的方式，令本書讀來味同嚼蠟，這其實也是史料學派的流弊之一。史書一旦不堪卒讀，畢竟喪失司馬遷以來的史學寫作傳統，果真成為斷爛朝報。更何況，史料學派對於檔案的理解往往流於「讓史料自己說話」的單面向思考，殊不知躲藏在文字背後的圈圈密密，往往才是真正驚心動魄的歷史實相。這種史才與史識的培養，當然不是片面的史料教育所能補足。作者在寫作本書過程中，蒐羅了令人嘆為觀止的史料數量，卻犯了片面剪裁與單向思考的毛病，使得本書原本表面上最大的優點，反諷地成為論述上的致命傷。